

學人時論

全球經濟衰退的惡夢逐漸過去，人們满怀希望迎接世紀的又一個十年，中國經濟這趟巨型列車又開始了高速前進的征程。出口加工工業迅速恢復後，不料近年來困擾沿海地區製造業勞工短缺的問題開始突顯，今年尤甚。還記得年初四過後，珠三角加工製造業的人力資源部主管紛紛出動到各地火車站立牌拉客，地方政府更是鼎力相助。

為什麼專家預測中國至少還能享受十多年的人口紅利會消失得如此之快？勞工短缺究竟是真實的市場反映還是只是勞資博弈下的虛假表象？

人口結構生變

中國實行了31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的滯後效應已經顯露，製造業中堅力量的20歲至39歲年齡段人口減少逾五分之一。從1990年到2000年的輕工業時代，吸納了1億多豐富而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到2009年，這些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製造業工廠的工人使家電、服飾、玩具、陶瓷等45個行業的100多種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2000年至今的重化工業時代，依靠資本和技術的大工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開始減弱，就業形勢日益嚴峻起來。未來15年內，中國新增勞動力總量將急劇下降，目前低技術勞動力的供給已經達到頂峰，正面臨向下的巨大拐點。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高端勞動力供應則會快速增長。勞動力將逐步替代資本成為我國最稀缺的要素，這意味着造就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廉價勞動力無止境供給行將結束。

另一方面，隨着農業技術的推廣和農業機械化的普遍使用，鄉鎮企業經歷90年代初的輝煌後日漸式微，8億農民中仍然有2億多富餘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向城市的製造業和服務業轉移。雖然正在發生的勞動力結構變化會影響到製造業的勞動力供給，但目前所能提供的勞工數量還不至於達到如此短缺的程度。因此，人口結構變化並不能完全解釋沿海地區嚴重的勞工短缺。那麼，是什麼原因加速了沿海地區的勞工短缺呢？

多種因素加劇勞工短缺

一是80年代後出生的民工生活方式與觀念的改變。受教育普及之惠，年輕一代進入城市的動機與他們的父輩完全不同。他們嚮往都市的繁華，滿懷理想地憧憬，希望在城市謀求好的工作和發展機會，受人尊重和體面的生活。不再像他們的父

沿海地區勞工短缺之底因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許晶華

母一樣，只是為了獲得比農村更高的收入，甘願忍受僱主的喝斥、城裏人的鄙視。

繁華的都市並沒有給他們更多的仁慈，沿海地區的製造業仍然沿襲他們父輩的生產與管理模式、繁重的勞動強度、微薄的收入和城市管理的森嚴等級，粉碎了他們的理想和希望。憤怒者群起反抗，不屈者四處流浪，柔弱者忍耐堅守，苟且者逆來順受，迷惘者失望退卻，墮落者走上歧路，絕望者含恨解脫。

二是農村勞動收入的迅速增加，縮小了與低技能製造業勞動收入的差距。政府為縮小城鄉差距，從2004年起開始實施新農村建設運動：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對農業生產扶持和補貼，大幅削減農業稅費，改善農村公共服務，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等。這些措施見到了明顯成效，農民收入以兩位元數的速度增長。

與此相反，民工工資在2000到2004年年均增長3.5%，2004年至2007年增長7%，之後才達到兩位數，明顯落後於農民收入增長的幅度。近期珠三角頻繁的罷工事件並大有在沿海地區蔓延之勢，與低工資不無關係，是城鄉二元結構得到改善的必然結果。

三是內地工業化加速。金融危機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表現強勁，基礎設施和工業化建設快馬加鞭，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在收入與沿海地區相差不大的情況下，更能吸引農村富餘勞動力就近就業，因此，沿海地區的工作機會缺乏了像早期一樣的吸引力，製造工廠裏一人離去，有十人等待填補的繁榮景象早已不復存在。同時，出於對家庭有更多照應的考慮，那些在沿海地區工作不如意者，紛紛回到家鄉附近的城市另尋機會，加劇了沿海地區勞工短缺。

四是受戶籍制度的限制，遷徙的勞工很少能夠在城市紮根。他們受到歧視並區別對待，難以享受到城市居民那樣的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使只能獲得微薄工資、但決心在城市紮根的民工生活無比艱難，尤其是那些到城市後搬出了工廠宿舍並組成家庭的民工。高不可攀的房價、不斷加碼的水電氣收費單、搖擺不定的食品價格、子女入學的高門檻和高費用，都使他們在城市生活難以為繼。

五是城鎮居民中進入就業市場的獨生子女，由於工資太低、工作太辛苦或工作環境太惡劣，許多人寧願在家「啃老」，而不去填補空缺出來的工作崗位。

名家指點

內地勾地制度待完善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蘇偉文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碩士 劉志財



蘇偉文

勾地制度是香港地產市場的一個特色。一般來說，發展商資訊較政府少，不知道政府的土地底價，勾地可令「不到價」的土地不致「流拍」，使政府的土地政策有「托市」的作用，在香港曾發揮一定穩定房地產市場的作用。但在房地產升溫時，發展商可以選擇不勾地以降低供應量，進而推高樓價，可見勾地制度是一把「雙刃劍」。

在香港發揚光大的勾地制度已進軍內地。不少地方政府在財政上過分依賴土地收入，更與企業連成一線，推高樓價。勾地制一方面能托高地價，增加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另一方面向樓市傳遞信息，使樓價向上，有利發展商繼續謀取暴利。

金融海嘯期間，中央政府為達致保八目標，加大固定投資的投資力度。部分國企受惠於這項政策，加上身份特殊，輕易獲得大量新增貸款，用於大量購入土地。過去一年，國企尤其是央企積極參與土地買賣，衆多大城市的「新地主」便是由國企或央企買入，造成地價和樓價雙雙屢創新高。

於是，這邊廂地方政府以勾地作價增加收入，那邊廂國企因擁有大量低成本資金卻苦無出路而不怕買賣，在有供有求的情況下，官商自然成為推高樓價的最佳拍檔。這現象與實施高地價政策的香港十分相似，即使兩地政府托高地價的動機有所不同。

以內地現時的環境，靠勾地來調控樓市只會火上加油。

要成功透過勾地來穩定樓市，政府必須先從加強資訊流通和完善法規方面着手，製造有利的客觀條件。

ECFA 令台經濟轉骨

台灣淡江大學大陸所教授 潘錫堂

海峽觀察



衆所矚目的第五次陳江會談，於上月29日在重慶完成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ECA)的簽署，這不僅象徵兩岸關係將邁入新紀元，更標誌着台灣可望走出經濟被「邊緣化」的困境，重新與亞太區域乃至全球經濟主體接軌。

與東亞自由貿易區綁在一起

兩岸得以順利簽署ECFA是順應全球貿易自由化、區域整合板塊化、雙邊協議普及化的大趨勢，也是維護並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的必要舉措。其能順利推進且所獲優惠大於預期，主因在於大陸立足兩岸同胞情，從而落實對台「讓利」。如今台灣既能因得道多助，而將利益極大化、衝擊極小化，實已體現馬英九當局洞察時代趨勢，引領產業開發壯大，奠立台灣經濟發展基業的器識、格局與能耐，終於能夠在不能再拖的時間內，做了不能不做的事。

以ECFA雙方的早收清單為例，台灣爭取到539項，計138億美元；台灣給予大陸的早收清單為267項，金額只有台灣的五分之一。台灣最關切的農產品並未對大陸進一步開放，甚至爭取到18項農產品可輸往大陸。因此整體而言，台灣獲利大於大陸，無怪乎，台灣的官員認為大陸在ECFA談判「頗有誠意」，對最後結果感到「收穫頗豐」。

短期而言，最明顯而立即的影響，是台灣有539項產品輸往大陸能享受零關稅的優惠，無形中增加台灣產品的競爭力。對台灣的企業增加業績、提升島內經濟成長率，甚至增加就業市場需求，都有正面的效益。但更深入且長遠看，ECFA的簽署象徵兩岸經貿關係邁入一條正軌。往昔台灣有對日益「邊緣化」的憂慮，但由於ECFA，台灣與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之一——東亞自由貿易區綁在一起了，此憂慮可望解除。

港事講場

應繼續聘外傭帶孩子嗎？

楊漢群

6月中，不知從哪兒傳出謠言，指香港將會調升外籍家庭傭工的薪金。謠言當然不能持久，但已一度引起外傭僱主關注，擔心會增加家庭開支。然而，港人除了從金錢的角度計算聘請外傭的經濟成本外，有沒有想過其他看不見的、難以計算的成本呢？

聘外傭莫見利忘弊

香港引入外傭，始於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經濟騰飛，社會日益富裕，外傭人數大增。到了今天，外傭已成為香港的重要勞動人口。根據入境事務處2008至2009年年報的數字，截至2009年3月31日，外傭人數有257872名，當中約有49%是來自菲律賓，來自印尼和泰國的則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在香港，不願生育的夫婦大多不聘外傭，有生育的夫婦多育1至2名孩子，如聘用外傭則多只聘1人，超過25萬外傭，就表示有超過這個數量的孩子由外傭照顧，外傭對香港下一代的影響力不可謂不大。

過去30多年，外傭令大量女性得以投入勞動市場，對提升香港經濟實力和女性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凡事總有正反兩面，外傭在貢獻香港的同時，也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加添不利的變數。

過度照顧製造「港童」

最明顯的是影響新一代的自我照顧能力和責任感。現時，一般雙職中產父母，多聘用外傭

照顧孩子。外傭要「做好呢份工」，照顧「小主人」時自然是唯恐不周。可是，孩子自小由外傭照顧起居生活，在培養自我照顧、負責任的意識上，早早就已打了折扣，甚至出現「港童」現象。所謂「港童」，是泛指因受過度照顧而缺乏正常自理能力、既倚賴又橫蠻的香港兒童，多出自聘有外傭的中產家庭。如此環境下長大的兒童，實在很難期望他們日後能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今天，很多僱主投訴新一代年輕人責任感太弱、工作態度欠佳，當中與外傭有多少關係？實在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可惜，這是一個很難用港人習慣的商業會計數字解答的問題。

外傭無助文化承傳

另一個沒有那麼明顯，卻又十分重要的，是文化承傳的問題。外傭是外來的合約勞工，她們只要照顧好僱主一家的起居生活，就是盡了自己的責任，僱主很難、也不應該對她們有額外的要求。可是，港人或會忽略家庭照顧中的文化承傳。

任何一個社會的父母，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都會在潛移默化之下，將本身民族、國家、文化、家庭的觀念灌輸給下一代。這對民族、國家文化的薪火相傳及持續發展十分關鍵，其重要性不下於學校教育。一些富裕國家如日本等，對輸入外傭有非常嚴格的限制，文化承傳是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因素。這些富國不是「請不起」外傭，而是它們明白由父母親自

等措施，將逐步顯現出來，且其效應將越來越強、受益者越來越多，必將使兩岸各層面關係益加密不可分。儘管ECFA簽署將為台灣帶來機會，但台灣企業仍須藉由ECFA此一合作互利的平台，從事脫胎換骨、升級轉型之舉，進而打造未來黃金10年發展願景，方為當務之急。

尤有進者，後ECFA時代的首要工作，就是台灣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馬當局寄望兩岸簽署ECFA之後，藉由ECFA談判經驗來洽談FTA，甚至期待ECFA可作為台灣與他國簽訂FTA的媒介。

事實證明，兩岸簽署ECFA後，國台辦主任王毅在第一時間表示，台灣與他國簽訂FTA，大陸將「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歐盟及日、韓等國對大陸有此表態都樂於正面看待。

誠如馬英九7月1日在記者會上表示，ECFA對台灣、兩岸乃至全世界都非常有意義，更讓台灣跨出三大步：讓台灣走出被邊緣化的威脅、讓台灣創造更多商機、讓台灣更受國際社會重視。可見馬英九把簽署ECFA比喻為台灣經濟「轉骨」，誠非虛言。



6月29日，兩岸正式簽署ECFA。

照顧孩子，才能讓自身的民族文化長存不衰，這是關乎國家民族前途的頭等大事，當然不能，也不可能假手於外國來的女傭。

香港是一個以「搵食」為核心價值的富裕社會，關心文化承傳的人不多，照顧孩子的事，就花一點錢，交給外傭料理好了。不過，在「見外傭多過見父母」的情況下，香港孩子的文化底蘊日益膚淺，恐怕是難以避免的事實了。近十多年來香港文化產業光輝不再，與外傭有多大關係？可惜，這又是一個難以用商業會計數字解答的問題。

停聘外傭可增競爭力

沒有外傭照顧孩子行嗎？答案肯定是「行」。不要忘記，港人一直強調「獅子山下」的艱苦拚搏精神是香港數十年來的成功之道，也是香港未來競爭力之所在，故不斷反覆讚美「獅子山下」的艱苦時代。那年代的香港孩子，很多不但自小就要照顧自己，還要照顧弟妹，甚至協助父母工作，根本不可能聽到「外傭」這兩個字，不也是成長得很好嗎？長大後不也是社會的棟樑嗎？今日香港的中產父母，為何要帶頭破壞「獅子山下」的艱苦拚搏精神、削弱香港未來的競爭力呢？

是否應繼續聘請外傭帶孩子呢？為了下一代和社會的長遠發展，香港的父母實在需要認真思考一下這個問題。要知道，如何教育下一代、如何塑造社會的未來，是香港父母的份內事，外傭是完全沒有這個責任的。

眾議園

政綱承諾只是選舉手段

戴慶成

遠的例子，有我們熟悉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他們上台前都強調要對華強硬，但上台後卻紛紛變臉，反而展開親華的破冰之旅。

至於近的例子，則有美國總統奧巴馬，雖然他參選前多番表示致力「無核世界」，但在今年新一年度預算卻大增核武研究開支，惹來反核組織質疑。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原來，在勝選的最高考量下，政客必然發表一些好高騖遠的演說。少數競選者為了達到競選目的，甚至甘於承受能力達不到的風險，被迫開出政治支票來換取選票。但從另一角度看，政客違背選舉時的承諾，其實也有其現實性。作為一個政黨，未執政之前，都帶有不少理想主義色彩。但上台後，他們就會發現理想往往與現實無法結合，結果被迫隨着環境和政

治現實修正政綱。這並不表示他們的立場左搖右擺，而是一個務實的做法。

在今次的政改大戰中，民主黨與其部分支持者的最大分歧，其實就在於上述兩點。一方認為民主黨混水摸魚，欺騙選民；另一方則認為既然中央有讓步，為什麼不去通過，然後跟着再去爭取未能獲得的要求？這樣勝過什麼也得不到，何況再原地踏步更虛耗時光和精神。

我們要知道，政黨最重要的功能是代表民意，即代表人民發聲。換言之，政綱只是從政者施政的一個手段，而非終極目標。民主黨這次沒有堅持選舉前的承諾，是欺騙選票，還是看準時勢，順從衆多選民的主流意願？現在既然眾說紛紛，那麼最好就是在下一屆立法會選舉中見真章。

相比之下，批評持不同意見者「癌症上腦」，則明顯是個拙劣的做法。